

编者按

斗转星移七十载,沧海桑田一念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启了新中国历史的纪元。英雄的吕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赴汤蹈火、浴血奋战,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出了巨大牺牲和卓越贡献。即日起,本报和吕梁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联合开设“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红色记忆”专栏,刊发一系列纪念文章,以纪念曾在吕梁战斗和生活过的革命前辈,感怀伟大祖国,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同时,用这些永恒的红色记忆,激励吕梁儿女勇往直前、奋发努力,为建设美好家园而不懈奋斗!



人民的公仆 战士的兄长

——忆贺龙元帅二三事

□ 张维勤

每当看到贺龙的照片以及老首长们写的怀念贺龙的文章,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他在晋绥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首府兴县蔡家崖,指挥晋绥三百万革命军民坚持八年抗战,杀敌御侮,与敌人拼搏的光辉形象。他那高亢爽朗、满怀抗战救亡激情的讲话声与将军的风姿气概,仿佛仍在眼前回荡。后来虽然蒙受不白之冤,遭到“四人帮”的迫害致死,但他的丰功伟绩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1943年到1948年间,我在兴县抗日民主政府民政科工作,有幸多次接触过贺龙,亲自看到和听到有关贺龙关心群众疾苦,维护军纪军风,尊重地方领导,爱兵若子等数事,摘记如下。

大姑娘没裤子穿 地方政府要关心

1944年,贺龙去延安开会,返回途中经过兴县花子村找水饮马。可巧一进村,遇到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急急忙忙往家中跑,贺龙和警卫员很有些奇怪,随行几步才发现这个女孩裤子破绽百出。当即找来村干部询问情况,才知她父病不能下地干活,再加日寇扫荡,家中生活困难,少吃没穿。贺龙回到司令部后,当即指示有关部门转告兴县领导,要关心群众疾苦,并动员司令部干部战士将已经俭朴的穿着再挤出一些救济群众。

专署和驻地机关响应贺龙号召,开展访贫济贫活动,把粮食定置从一斤半减到一斤四两(当时是十六两)的小米再减至十五两。专署机关提出:“无事不点灯,破纸要集中,料炭重生”以节省行政开支。当时军区卫生部副部长祁开仁同志来兴县参加中西医结合座谈会,也无例外地遵守一室一日十斤烤火炭的规定。当我们要给他增加烤火炭时,这位医道精深的专家还解释说,他是南方人,火炕不能烧得太热,烤火炭不应增加了。实际上晋西北是相当冷的,窑洞内的温度也很低,这次会中,由祁开仁副部长和老中医张尊伍先生合作,将建设科长孙启民同志爱人的腹水症给治愈了。

机关后勤干部抬担架

1945年秋鬼子投降后,从延安输送各根据地的干部、学校、机关均须路过晋绥总兵站(驻兴县城),再加绥包、晋北战役,兴县沿公路旁群众支前任务十分繁重。意见常常反映到贺龙那里,贺龙指示行署搞民政工作的同志设法解决,经调查研究征求群众意见后,决定用公私集资办法,在兴县城、康宁镇、界河口三个兵站所在地设立三个毛驴运输队,解决物资和轻伤员运送外,对重伤员和残废军人还得靠担架解决。

当时部队后方医院还在黄河边的碧村,而二十里铺至黑峪口沿线,机关、部队、学校林立,贺龙了解情况后说,为什么这些单位的后勤人员不能抬担架。对此我们经过摸底,在负担能力许可范围内,把沿途的机关、学校和部队的后勤人员编成担架队,

轮流值班,遇重伤员逐村转送,并开给收据,以便稽核,受到群众赞扬,进一步减轻了群众负担。

有问题由地方政府 统一解决

1946年春节,北坡露天剧场举行春节团拜会,晋绥一地委的领导也去了,这时由原司令部小灶管理员带领城关附近30多名退伍残废军人,也去给军区首长拜年,并向贺龙等首长提出一些生活生产中的具体问题,要求解决。当他们申述完后,贺龙把专署乔钟灵专员叫来,告诉退伍军人要发扬我军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有困难由地方政府协助解决。当时我在现场,乔专员又叫我去,当着贺总面一一做了交代。事后这些同志在县、区、村政府的关怀与自我努力下,一直安心生产,力所能及的事,不少人建立了家庭。有些人的后代至今留在兴县,群众称他们是外省的兴县人。

贺龙关怀爱护复员退伍残废军人是一贯的。战争中晋绥一专署民政科受行署民政处委托,代发一部分退伍证和残废证。把盖有司令部行署关防并有贺司令员主任签发的空白证件,编号交我们代发。由于当时条件差,对特等残废军人年抚恤小米600斤,发棉、单衣各一套,三等残废军人只发200斤小米,一套衣服,其余不足靠自力更生。这样残废军人几乎全部安置在沿大道公路旁和县城附近等条件较好的地方,由此使得村村爆满。为此贺龙要求地方上尽力做好安置工作,特别对老红军的安置;同时要求复退军人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共渡难关,并经常通过行署民政处了解情况。当时民政处杜心源处长、安法孝科长常来专署检查督促工作,转达贺总的指示。

爱兵胜似亲人

贺龙与士兵同甘共苦是出了名的。1943年,军区一位兴县树林村的战士,托人向贺龙反映,他的未婚妻被人搞成大肚子。贺龙当即批示兴县县政府认真处理。经司法科审理,破坏军婚者受到法律制裁,问题得到解决,那个战士也安心服役。

一二〇师特务团原来大部为南方籍战士,到晋西北后,残酷的战争中连续减员,每年补充不少兴县籍战士。记得1944年离石官庄垣战斗,特务团打一次遭遇战兴县籍战士牺牲30多人,烈士名单送民政科后令全科大吃一惊。1945年,鬼子投降后,特务团兴县人大增,人称兴县子弟兵。后来,特务团所属军区警备营准备开拔远去战斗,由于兴县籍战士离队较多,影响了开拔,只得进行整训。为此贺龙指示要认真做好拥军优属工作,解除战士后顾之忧。民政科决定派我到警备营与兴县籍战士逐个谈话,了解疾苦和要求。我和孙怀礼营长、张哲生教导员同住一个多月,与200余名兴县籍战士逐个谈了话,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归纳起来有四个方面:一是家中确有困难,那时实行兄弟二人动员一人参军,三人动员二人参军,留家中的有些是未成年的少年或小孩,加之日寇扫荡,晋西北十年九旱,灾情不断,确给一些家庭带来生活困难。二是婚姻问题,提出军婚没保障,影响战士情绪。三是区村干部有的办事不公,减租减息,社会救济,民事纠纷处理得不公正还受气。四是不愿离开故乡,北上绥远打仗。根据所了解情况,我们如实向县领导作了汇报,并立即召开区村干部会,对所提问题逐个落实解决,深得贺龙肯定和战士谅解。不久他们离开兴县北上参战。

1946年,丰镇、集宁一线战事频繁战斗激烈。贺总亲临前线,深入连队访问。当时一个兴县田家圪台村的战士说他家生活困难,贺总当即让秘书发电报给李井泉政委转告兴县解决。一个阴雨连绵的傍晚,我和刘祖汉当即出发。那时山洪暴发,路面稀滑。到达该村已是晚上近十点钟了,村里狗狂吠不止。当我们出现在那家军属面前时全家大吃一惊,以为儿子牺牲了。我们说明来意后,老头大发脾气,骂道:“放他娘的屁,尽给贺司令员添麻烦”。并领我们看了他圈中的牛驴和缸中的粮,叫起已入睡的儿媳问有什么困难,儿媳只是笑不语。次日,我们回司令部汇报,临行这个战士的父母妻子一再嘱咐叫他安心杀敌,少给领导添麻烦。

以上点滴回忆,以表深切怀念之情。

1945年春,汾阳敌工部武工队,委派赵铭和爱人吴润英同志,立足于汾阳城内,为我方搜集并转运各种子弹。

当时,汾阳城系敌人心腹重地,岗哨林立,防守严密。从敌人手中搞到子弹,已非易事,再把子弹从敌人的眼皮底下转送出去,就更为困难。怎么办呢?赵铭夫妇经党组织同意决定打入敌人的“二六九”兵站子弹库内。他们经多方支持,赵铭同志在敌人的子弹库内当了一名收粮管账的差事。经过一段工作,赵铭同志发现有个姓赵的管理人员,爱吃爱喝,甚至爱抽“料面”,但他常没有钱,赵铭同志抓住这个人的弱点,经常以交朋友、称兄道弟的做法,和他热乎起来,并经常有意地借给他钱用。由于姓赵的还不起钱,赵铭同志就暗示用子弹顶债。起初,他是几十发几十发拿,后来就整箱往外拿。把子弹搞到手后,白天放在麦垛里,晚上弄回家,然后,由吴润英同志负责向城外运送。

默默无闻的战士

——记地下工作者赵铭、吴润英同志

吴润英同志当时只有30来岁,但很有见识。开始,她是利用自己三个孩子往外带。办法是:用长布袋把子弹围在孩子的腰里,外面穿上衣服,纹丝不露,自己领着孩子大大方方的通过岗哨。他们今天出南门,明天出北门,后天串东门,避开了敌人的注意。

后来,搞到的子弹多了。组织上决定用毛驴驮运,由栗家庄派出粪驮进城,夜深人静以后,吴润英家的后院,把子弹装进粪驮,伪装起来。第二天等城门一开,由孩子们拉着臭气难闻的粪驮子出城。由吴润英按照指定的地点交给我武工队。

从1945年到1947年,赵铭、吴润英同志,在险恶的环境中,冒着杀头的危险,为武工队搞到并送出了四万余发子弹,有力地支持了党在汾阳的武装斗争。他们于1946年8月中旬,经贺礼文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6月,由于叛徒出卖,赵铭同志被捕。吴润英同志闻讯逃到了娘家罗城村,后又被抓,在押解途中,我游击队、武工队采取措施,阻击敌人,营救了吴润英同志。

1948年7月,汾阳解放了,赵铭同志出狱后,继续参加全国解放战争,后又赴朝参战。赵铭同志回国后,吴润英同志离开汾阳随军工作。1972年赵铭、吴润英同志转业回到汾阳。

梁崇定供稿 郝世民整理